

The Meaning of
the Body 書評

意義的修復與理解的美學： Mark Johnson 的身體哲學

趙綺芳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無論從語言、認知、或是身心哲學的觀點而言，Mark Johnson 2007 年的著作《身體的意義》(*The Meaning of the Body*) 這本書，都可看成是一種對西方根深蒂固的二元論叢節之修復：修復在西方哲學長期以來被迫剝離的身、心；修復意義被語言哲學家化約為字句的空洞化；修復心智脫逸出生存世界的孤立；修復抽象思考與體現之間的裂隙；修復「高等」與「低等」的心智作用之間的人為差距。本書雖討論身體的意義，卻獨到地使用美學 (aesthetics) 一詞，作者對美學的用法，也是出於一種修復的立場：「美學是那些自認正在建構大型的形上學、認識論與邏輯學紀念碑的哲學家們削去的 [無用] 石頭」(ibid.:208)，然而作者認為這塊被棄之不顧的房角石，可以用來形塑意義理論。究竟這個意義的理論如何有別於傳統英美分析哲學或語言哲學的觀點，而和身體的當代研究或甚至人類學觀點有所共鳴？

作者自陳他使用廣義的意義一詞 (ibid.:25)，他的核心主張在於意義是體現的。作者看待身體為一具有感官動能 (sensorimotor) 之有機體，意義則是在一個持續的身體—環境互動過程中作用。換言之，意義並非如空穴來風，而是深植於身體與事物的聯繫之中，透過我們感官動作的活動，不斷製造；意義不僅是在情感與思想的行動中有意識地被接受，意義下探深達我們與環境間的肉身交會 (corporeal encounter, Ibid.) 意義絕非僅限於字詞，而是在於所思、所感、所行，取決於經驗反覆出現的特質、形態與結構，即便大多時候經驗在無意識或自動的情況下決定了一個人的理解、選擇、以及如何表現自我 (ibid.:78-79)。Johnson 反駁真理—條件論語意學式的 (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s) 意義觀點，轉而強調質性、意象、意象圖式、譬喻與情感輪廓，他認為這些才是意義的存在證據 (ibid.:208)。這些內涵也是各種藝術經驗的重要質性，或許說明了作者為何要以美學一詞統括理解。

作者看待身體，如同心智，不是一個被迫分離而抽象的本體，而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體 (the lived body)，這種論點明顯受到現象學者梅洛龐蒂的影響。在本書中，作者更加明確地擁護梅洛龐蒂的身體觀，並且引用現象學者 Maxine Sheets-Johnston 分析動作而得的諸多說法。後者的核心觀念之一是動的身體 (the moving body)：我們確實是在動作中發現自我，依靠動覺我們進入身體習慣，特別是本乎我們存在所憑依的身體 (our being the bodies we are)，所成長出獨特的運動方式。在動作的自發性中，我們發現了延伸的手臂、蜷曲的脊椎、屈膝、緊閉的嘴。我們在動的過程中理解我們自己 (Sheets-Johnstone 1999:136，引自 Johnson 2007:20)。Sheets-Johnston 的理論晚近常被舞蹈研究者引用，卻鮮少為主流哲學討論注意。Johnson 則據以發展出動作的意義觀點：動作是我們學習事物意義、以及我們逐步獲取對世界之認識的主要方法之一 (ibid.: 21)。

然而作者亦直言現象學的描述和分析，只能讓我們透過反省的過程自覺到事物於我何義，但較難證明無意識層次的理解過程，因此他亦借助 (第二代) 認知科學晚近的理論，佐證體現的意義。界定認知科學為一種心智科學，作者陳述認知是一種體現行動的形式，透過包括嬰童如何理解等實際的例子，作者議論認知亦發生於有機體—環境的互動，而非緊閉於私密的思想心智之中。包括語言在內的抽象理性過程都是社會和文化的情況 (situational) 活動。

Johnson 對情況¹的討論，受到美國實用哲學家杜威 (John Dewey) 莫大的影響，杜威的實用哲學是作者 Johnson 在本書中採借的第三支理論槓桿。通篇讀畢全書，或許會有一種錯覺，Johnson 好似從傳統語言哲學陣營叛逃投靠至杜威麾下、甚至成為他的信徒了。作者不但引用杜威的身心 (body-mind) 用語，強調杜威的核心理論宣示了思想、理性、或邏輯推論都不能在缺乏情況的感受質性 (the felt qualities of situation) 下存在。脫離了感受，邏輯不能成就什麼。杜威對於質性、情狀的強調，根植於意義的共享性與互動面：以疼痛、

1 情況 (situation) 一詞源自杜威的邏輯理論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1938)，杜威認為邏輯不僅是抽象的操作，而有情境的本質。他對情況定義如右：“What is designated by the word ‘situation’ is *not* a single object or event or set of objects and events. For we never experience nor form judgments about objects and events in isolation, but only in connection with a contextual whole. This latter is called a situation”。(pp. 66，轉引自 Thayer 1981[1968]: 171)

歡樂、香氣、顏色、噪音、語調為例，這些潛在的感受透過語言被分辨而確認下來，然後被客體化，成為事物即有的特質。杜威接著強調：「然而質性從來就非存在於有機體“之中”，它們是超有機事物與有機體共享的互動特質，一但命名，名稱使得事物能夠被確認及分辨，在進一步的互動中成為方法。亦即當語言—不僅是說出來的字詞、也包括其他的象徵互動—被用於溝通時，在過程中透過共享的意義導致心智浮現（the emergence of mind）」。（Dewey 1981[1925]:198，引自 Johnson 2007:266）Johnson 據此做出結論：意義根植於我們的身體互動，並且一向是社會性的一沒有可供探索事物的溝通互動和共享語言，意義無法完整存在（ibid. :266）。

行文至此，一股聽似與人類學家葛茲（Clifford Geertz）強烈共鳴的聲調著實難以令人忽視。其實自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一書以來，關注身體的哲人們，對於身體所存在並行動於其中的生活世界，往往有意無意地使用象徵文化等詞一言以蔽之，²但是缺乏對於身體意義如何在文化世界中作用缺乏深刻的討論。Johnson 在書中並未引述任何當代人類學家的觀點，然而他對於文化差異的敏感度，反映於他始終將反省的主要對象鎖定在他自己所屬的社群：不管是英美的分析哲學、或是繼承自啟蒙時期歐洲以來的視覺文化。這種對文化中既定概念，如身、心、意義等的反思，卻不折不扣是人類學式的。Johnson 的議論成就於二十世紀以來跨領域學科智慧結晶的交流與聯繫：實用主義哲學、現象學、認知科學中的腦神經科學等等，可視為是一種對於全人探求的集體修復。而如下他對身體意義的完整述說，卻再度帶領讀者思考身心俱足的個人、世代、社會實踐、文化創造與生活世界之間的不斷往返，一個以意義為名的、人類學式的雋永提問。

意義並非存於腦部，也非存於脫離身體的心智。意義需要能作用的腦，存於活著的身體、並與環境—社會、文化、生理與生物的環境—

2 例如梅洛龐蒂提及：‘Our body, to the extent that it moves itself about, that is,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inseparable from a view of the world and is that view itself brought into existence, is the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not only of the geometrical synthesis, but of all expressive operations and all acquired views which constitute the cultural world.’ (1999[1962]: 388)。至於這個文化世界的內涵，梅洛龐蒂並未續加申論。

互動。文化造物 (cultural artifacts) 和實踐，例如語言、建築、音樂、儀式行動和公共制度，皆保存了意義的面向，形成世界的客觀特質，沒有這些文化造物，我們所累積的意義、理解及知識，無法跨越時間被保存，而每一個新世代必須真的從頭開始描繪。好在還有社會與文化認知，我們無須重新學習世界的意義，每個孩童和社會群體得以運用這些物件和活動，內中沈積了文化的意義與價值。然而必須謹記的是，那些社會文化造物、實踐和事件本身並無意義。只有當使用語言、藉由象徵、符號而生活的人們欣賞音樂、參與儀式、重新活化制度的實踐和價值時，它們才有意義。(Johnson 2007: 152)

參考文獻

Johnson, Mark

2007 *The Meaning of the Body: Aesthetic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leau-Ponty, Maurice

1999[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Thayer, Horace, Standish

1981 [1968] 'Dewey' in *Meaning and Action: A Critical History of Pragmatism*. pp. 165-204. Indianapolis, Indiana: Hackett.